

郡邑之盛: 明清松江城的空间形态与经济职能

黄敬斌

摘要 明清时期,松江府城虽在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上逊于苏州、杭州、南京等大都市,但在江南普通府县城市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从宋代以来,松江的城市建成区已形成沿秀州塘—南俞塘线型延伸的格局,历明、清至近代而不变,体现出典型的有机生长形态。明清时期的松江城一度有过发达的手工业经济,并且一直具有区域贸易中心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上海兴起之后,其商业市容仍颇为繁荣。过去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倾向于将行政治所城市视为处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下规划严整而工商业性格缺乏的单一“政治城市”。细致的实证分析显示,这种简单化的解释框架无法涵盖以松江为代表的明清江南府县城市。

关键词 松江;城市形态;经济职能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6)06-0001-11

作者简介 黄敬斌,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00433

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向来以历代都城及若干经济、文化名城(如苏州、扬州)为重心,1980年代以来,市镇因其“新兴”性质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此外,对于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低级治所城市,相关研究从数量到深度来说都较不足。^① 本文以明清时期的松江府城为中心,从城市形态、经济职能两个方面展开专题讨论,在关注这一普通治所城市个案的同时,试图对相关研究领域内的一些传统看法提出反思。^②

一 起源与建城: 松江城市的早期历史及其变迁

唐天宝十载(751)置华亭县,为松江府城行政建置之始。然而,当地聚落是否晚至唐代,甚至在建县之后才形成,实不易言。在此之前,“华亭”一名屡见于载籍,地方志中已做过细致的考证。据《云间志》,汉末孙吴封陆逊为华亭侯,为“华亭”之名始见,志中并考证汉法,“凡封侯,视功大小,初亭侯,次乡县郡侯”,陆逊初封华亭侯,可知华亭为汉代亭名。^③ 陆氏家族世居华亭,其后人陆机在“八王之乱”中被杀,临刑前感叹“华亭鹤唳”,成为著名典故。^④ 然而,华亭县得名于陆氏华亭,县城

① 前人对这一研究现状的评述,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城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梅新林、陈国灿主编《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叶舟《清代常州城市与文化:江南地方文献的发掘及其再阐释》,博士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7年,第10-12页。

② 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中,有关松江地区的研究积累不可谓不多,但以松江府城为核心的专题研究,可说迄无一见。何泉达对历史上松江府的建置沿革做了一些资料的整理和探讨,但其论述重心在于松江水利,见何泉达《松江历史和松江府建置沿革述略》,《史林》2001年第4期;陈平对松江城墙与城市形态的历史有简要的概述,但其论断较多可议,详后,陈平《松江古城小考》,《上海文博论丛》2002年第1期,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1页。其他区域史视角的研究,数量甚多,不一一列举。

③ 绍熙《云间志》卷上《封域》,《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1册,第6页。明代方志有“吴子寿梦始筑华亭”之说,见正德《松江府志》卷1《沿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册,第25页,其说不见于明代以前。

④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9页。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由拳县后改嘉兴,按各地志均以华亭汉代属娄县,梁置昆山县以后属昆山县。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24《南直六》,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第1200页。

所在却未必一定是汉晋华亭旧址。后世地志多谓华亭得名于华亭谷,而华亭谷“在县西三十五里,陆逊、陆抗宅在其侧”,^①或谓在“府西北二十三里”,即昆山以西的“长谷”,“(昆)山之得名,亦以陆机兄弟生于此,取昆山出玉之义”。^②但明清方志又有松江府城西南隅“旧西湖”,在“晋为陆氏养鱼池”之说,且有“唳鹤滩”,^③皆与陆氏典故有关。这些当地“名胜”,都有后人附会的嫌疑,因此华亭建县之前当地虽可能早已成聚,却难有确证。明代方志另有记载称“赵店,在府治西,昔未邑之日市东名赵店,今有神祠,谓之赵店土地。”^④则似乎在建县之前,府治(即唐宋县衙)以西已有“市东”为“赵店”的市场,这段记载不见于早期文献,其依据可疑。但它仍然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建县之前当地已经形成市集,地名实为“赵店”,建县之后,“华亭”这一深具历史内涵的名称逐渐将原地名覆盖。

晚唐五代时期,华亭县曾设镇戍,^⑤已是设县以后的事情,不能因此遂谓华亭“自镇为县”,方志中考证已详。^⑥此后历代为县,而隶属多更,元至元十四年(1277,南宋景炎二年)升为华亭府,翌年改松江府,隶嘉兴路。^⑦明兴,以松江府改隶京师(南直隶),以后历经分析,至清中后期共下辖7县(华亭、娄、上海、青浦、金山、南汇、奉贤),^⑧原华亭县治始终为府城。

松江城早期历史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城墙的始建时代。在以往通行观念中,传统中国城市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都有城墙环绕,尤其对于行政城市而言,城墙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观念近年来已得到反思。如成一农指出,至少从唐代至明代前期,对于大量地方行政城市来说,“无城”是更为普遍的现象,只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城市普遍有城墙的观念才能够落实。^⑨松江城墙的历史大体符合这一判断,据《云间志》,唐宋时代华亭县确有城墙,志称“县之有城,盖不多见,华亭邑于海隅,或者因戍守备御而有之”。其城“周回一百六十丈,高一丈二尺,厚九尺五寸”。又以宋绍兴年间“酒务凿土得唐燕胄妻朱氏墓碑,以咸通八年窆于华亭县城西一里”,证明“唐之置县,固有城矣”,而“废兴之由莫得而详”。^⑩顾祖禹以华亭城“相传唐末所筑,元至元中毁,至正末张士诚复筑之”。^⑪然而,“周回一百六十丈”的城墙,其规模充其量只是环绕衙署的子城,罗城或外郭城则不见记载,即使是子城,进入元代也已毁废。^⑫

因此,元代末年以前,松江大体是一座无(外)城的城市。有观点认为,咸通八年朱氏墓志所谓“县城”,就是外城,而《云间志》所载“周回一百六十丈”的城墙,是宋初毁废地方城市的城墙之后留

①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602页。

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卷24《南直六》,第1201页。

③ 正德《松江府志》卷2《水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91页。按《云间志》“陆瑁养鱼池”亦有二说,一说同正德府志,一说则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周回九里”,又称“瑁湖”,与《元和郡县图志》所叙华亭谷的方位约略相近,见绍熙《云间志》卷上《古迹》,《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9页。

④ 正德《松江府志》卷21《古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6册,第230页。

⑤ 五代吴越时杭州高僧永明延寿智觉禅师,出家前“二十八岁为华亭镇将”,见普济《五灯会元》卷10《青原下十世》,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604页。

⑥ 绍熙《云间志》卷上《封域》(《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7页)考证称“或者遂谓自镇为县,不知所谓镇者,唐因隋制,置镇将、副,以掌握防守御之事,县之冗职耳。唐季五代或用土豪小校为之,国初,镇将虽存而县令及尉实掌其权。……如自镇而为县,则新史輿地志诸书不应略而不言也。”其说颇确,华亭镇至宋代仍存,见正德《松江府志》卷14《兵防》:“宋制,县镇、青龙镇仍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745页)后世方志仍有称“隋有华亭镇”者,缺乏依据,见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1《疆域·沿革》,《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本,第127页。

⑦ 至元《嘉禾志》卷1《沿革》,《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417页。

⑧ 《明史》卷40《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920-921页;《清史稿》卷58《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97年标点本,第559页。

⑨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246页。这一结论是对他早期关于宋元至明前期“不修城”“禁筑城”政策探讨的延续与拓展,参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83页。

⑩ 绍熙《云间志》卷上《城社》,《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7页。

⑪ 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卷24《南直六》,第1200页。

⑫ 至元《嘉禾志》卷2《城社》全引《云间志》关于华亭县城的记载,后注“后无之”三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423页。

下的唐代子城。其说虽不能说全无可能,但毕竟缺少证据。^①相反,出土该墓志的宋代酒务所在地,据《云间志》的记载在县西五百九十步,而同在县西五百九十步的坊桥,后称丰乐桥,又称西亭桥,其具体位置在明代城墙的西门内。^②此地既然在唐代尚在“县城西一里”,虽然不清楚这个县城在东、南、北三个方向的延袤,但最大的可能,它不过就是围绕衙署而建的规制狭小的子城而已。元末张士诚据吴,在松江筑城,“周围九里一百七十三步,高丈有八尺,池广十丈,深七尺余。陆门四,水门四,东曰披云,西曰谷阳,南曰集仙,北曰通波。门各有楼,外为月城”。^③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城墙,作为驻有守御千户所的府城,即使在明代前期,这座城墙也得到了较好的修葺维护,并未像当时江南多数县城的城墙那样圯废失修。万历年间城墙加高至二丈四尺,历代有增修补葺,其位置与规模则未变动。^④

二 明清松江城的空间格局与地理形态



图1 民国时期松江城区图

资料来源《中国大陆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集成》,科学出版社1989-1992年影印本,第2册,“松江”。日本参谋本部陆军测量部1932年航空摄影,1937年测量制版。地名标定参嘉庆《松江府志》卷前《图经·松江府城图》,《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册,第47-48页;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首《图说·城内街巷图·城河图》,第114-117页;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松江》,上海两路营业所1934年版,第5-7页。县前直街、法院街均为民国时期名称。

A. 松江府衙旧址 B. 华亭县衙旧址 C. 娄县县衙旧址 D. 松江府学、文庙旧址 E. 华亭、娄县县学、文庙旧址 F. 明徐阶第,清提督府 G. 明东察院,清试院

关于明清时期松江府城的空间形态,有学者仅根据旧方志中的城图,即作出如下判断:“华亭全城呈方形,四角呈圆角形。”^⑤实际上,多数情况下,旧方志城图描绘的空间范围仅限于城墙以内,而且不精确、无比例尺、理想化(突出反映在城墙形状上),过于突出官方建筑物,对商业和居住区甚至

① 陈平《松江古城小考》,《上海文博论丛》2002年第1期,第80-81页;作者根据宿白对唐代城市“坊制”的建构理解唐代松江城的空间格局,并认为遗存至今的松江唐陀罗尼经幢在唐代立于“十字街”通衢之中,起着犹如鼓楼的作用,这一观点更缺乏文献证据,近于想象。参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285页。

② 绍熙《云间志》卷上《场务、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1、13页;正德《松江府志》卷10《桥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495页;崇祯《松江府志》卷3《桥梁》,《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77页。丰乐桥(坊桥)的位置,具体可见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首《图说·城河图》,第115页。宋代华亭县署,即明清时期的松江府署。

③ 正德《松江府志》卷9《城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441页。

④ 嘉庆《松江府志》卷13《建置志·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301-302页;光绪《松江府志》卷8《建置志·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3册,第201页。

⑤ 张驭寰《中国古代县城规划图详解》,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街道却缺乏标注,因此对于城市形态研究而言是很不完备且不可靠的资料。从相对精确的晚期军事地图中看(图1),松江城墙根本不是什么“圆角方形”,最多只能说是不规则的五边形,同对于传统中国城市“方正城垣”的想象相去甚远。

更为重要的是,图1所示松江府城的街区形态,清楚地揭示出城墙在界定中国旧城市空间形态方面巨大的局限性。图中所见的城市实际建成区(由反斜线阴影填充的块状区域表现),首先印证了章生道的经典论述:“许多传统的城市,把城内总面积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留给农耕”,而城门外的商业附郭往往“早在城内空间全部变成建成区之前就发展了起来”。^①另一方面,整个城区的空间形态呈现为醒目的线型格局,以沿河道两岸伸展、东西贯通的大街为主轴,从西侧跨塘桥一带至东门外大街末端,总长约5.5公里。这条长街两侧的南北向道路,皆缺乏纵深,即使是城墙内连接南、北门的两条大街,与东西长街相比长度也极为有限。城墙只是在这个线型城区中部偏东的位置圈围了一段,既不能限定全部建成区的空间范围,也不能决定建成区的形态特征。实际上,由于城墙修建的时代相对较晚,章生道“有城墙城市的形态结构特征首先决定于城墙的布局和城门的格局”^②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能成立。

决定松江城区地理形态特征的并非城墙而是水系,这在江南水网地带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在江南市镇的研究中,学者们早已指出“江南市镇的地理结构”值得注意的特征:“它们几乎都坐落于河流之畔,因此镇区的形状、市街的走向,都与河流有关。”“市镇作为工商业中心,作为人流、物流的集散地,必然会选择在主干河流两岸,使之成为商贾云集的水陆码头。”并因河形走向的差异而形成一河二街型、丁字(T字)港型和十字港型等诸种街区形态。^③松江线型长街的形态同样取决于河道:市河西起跨塘桥下秀州塘与古浦塘的汇合点,东流入西水门,贯城出东水门,这一段习惯上仍称为秀州塘,出东门后则称南俞塘,东流通过华阳桥镇后,分两道注入黄浦江。它一路与一系列南北向的河道交汇,仅从跨塘桥到西门就有“南北湍流十余道”,其著者有沈泾塘、西汉、菜花泾、大张泾等,城内交汇的南北支河则主要有仓河、田家湾、通波塘(出北水门)、邱家湾等,出东门后与南俞塘交汇的南北支河有洞泾、御史泾、邓泾等。^④正是这样的水系结构决定了松江城区的形态特点与街道走向,市河及其北岸大街(图1中标注为西门外大街、西大街、东大街、东门外大街四段)构成了整个松江城区的主轴,市河和大街的两侧,与南北向支河相应,形成了密集的小街巷,除了少数例外,这些街巷都不长,因此大部分城区南北向延展不超过一公里,甚至只有一两百米(如东门外大街两侧)。这些观察显示,松江城尽管规模比一般市镇大得多,主要市河两侧南北向的街巷体系更为密集复杂,且部分街区筑起了城墙,但城墙内外街区形态高度统一、连续,且与当地市镇的地理形态高度一致,具有突出的有机生长特征,^⑤完全可以视为一座“放大版”的一河二街型“市镇”。

大量资料证明,松江府城的上述形态特征长久以来已经形成,而非晚近变迁的结果。关于城内土地利用的状况,据明人记载,嘉靖倭乱之前,“城多荆榛草莽”,此后“士宦富民,竞为兴作”,^⑥晚明时“缙绅必城居”,^⑦城内居住密度当大大提高。即便如此,城内四隅始终相对荒凉。西南隅是一片低洼的水面,为宋元时代号称“郡城第一胜处”的西湖、小湖在筑城淤塞之后的遗迹。^⑧这一带在明代万历以前为城中“最号荒凉”之处,设有卫所驻军的演武场(后称小教场),此后虽有建设,也只限

① 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王嗣均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3、108页。

② 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9页。

③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94页。

④ 正德《松江府志》卷2《水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88-89页;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3《水利·水道》,第252-255页;光绪《娄县续志》卷4《水利志上》,《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5册,第356-357页。

⑤ “规划”与“有机生长”作为城市形态的两种基本类型,详细的定义和论述请参看A. E. J. 莫里斯:《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以前》,成一农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36-37页。

⑥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5《纪土木》,上海图书馆藏民国17年奉贤褚氏重刊本,第1a页。

⑦ 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第186页。

⑧ 正德《松江府志》卷2《水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91-93页。

于一些豪门大户所建园林,直至晚清,西湖、小湖的遗迹仍存,这里依然相当空旷。^① 城内东南、东北隅的街道与建筑同样较为稀疏,清代在东南隅设有若干军事机构及教场,民国时期甚至仍能在这里设置公墓;^② 东北隅有北禅寺遗址,该寺建于北宋,元毁,明初重修,当时描述称“其地宽衍悠邃,为吾松一大丛林”,岁久倾圮荒废,嘉靖倭乱时被用于驻兵之所,显然是城内便于利用的大片空地,经“戎马蹂践,鞠为榛莽”后,虽屡经整修,始终未复旧观。^③

相反,城外的街区向来繁荣,嘉靖倭乱时,松江府城一带迭遭劫掠: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在东门外,“自吊桥放火,北抵俞塘,南抵板桥,约七八里,烟焰烛天,三昼夜不息”。三十五年又在西门外“大肆焚劫,烟火七昼夜不绝”。^④ 充分说明东、西门外附郭街区的广大。据范濂所述,晚明时“松城四郊外,如南北两门素号荒僻,年来虽居民稍密,而土木未有大兴。……至东西二门,系商贾辐集之地,故倭夷回禄之后,宦室富民或以次更新,或以次修复,遂成都会。而西尤加三倍于东”。其时松江的鞋袜制造业,鞋店广设于郡治东,蒲鞋店几达百家,“郡城西郊”则“广开袜店百家”。^⑤ 稍晚陈子龙描绘谷阳门(西门)外市肆之盛:“凡仓庾囤箱之所积,鱼盐舰舶之所集,缟纈金锡、竹木蔬果处焉而贩,齿革羽毛、冶凫鲍鞞之工居肆以办,民器皆鳞次栉比于谷阳门外,凡七八里,抵于仓城。”^⑥ 晚明时,自跨塘桥至华阳桥已经被统称为“郡治大街”。^⑦ 这些描述与图1给人留下的印象可说是高度相符。正因为附郭尤其是西门外街区的发达,晚明时期松江地方士绅关于在谷阳门外拓建新城的议论屡见不鲜。嘉靖倭乱之后,在西门外也确实新筑了一座西仓城,但其功能限于保护水次仓,城周仅二里,^⑧ 在西郊广大市区中只占有相当有限的范围。

早期方志的记载显示,上溯至宋元时代,松江(华亭)城市形态的基本格局已有迹可寻。后世西门外大街一线不少寺庙建筑始建于宋代,略举如下:东岳行祠,《云间志》称别庙,在“县西二里”,即后来松江府衙以西二里,在谷阳门外秀州塘北岸,其“建置无考,宋朱右丞谔始大而新之”;^⑨ 妙严寺,“在府城西,东岳行祠之东,宋咸淳间”始建;超果寺,“在县西三里,本名长寿寺”,宋代已为名利;广化漏泽院,在超果寺西北,为宋崇宁中建;西禅寺,在府西白龙潭,宋嘉定间始建,名西禅兴福寺,又名龙潭寺;西林寺,在府西庆云桥北,南临秀州塘,宋咸淳间始建,本名接待寺;延恩报德院,在府西五里,秀野桥东延恩巷,为宋绍兴年间始建。^⑩ 从这些记载来看,在后世秀野桥以东、谷阳门以西这一带,早在宋代已是刹宇林立,伽蓝辉映。

不仅如此,宋代华亭县几个社会管理机构也设置在后世城门以外的区域。如安济院在平政桥西,至明清时期仍为养济院所在,并有多通宋代安济院管理事务碑刻遗留。^⑪ 平政桥入明代已不见于记载,考《云间志》:“坊桥在县西五百九十步,平政桥在县西六百二十步,长寿桥在县西七百五十步。”^⑫ 坊桥位于明代城墙西门内,已见前述,则平政桥约当今西门一带,或在筑城时毁废,而安济院

①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5《纪土木》,第3a页;嘉庆《松江府志》卷9《山川志·水》,《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211页;卷74《名迹志·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2册,第698页;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首《图说·城河图》,第115页。

② 嘉庆《松江府志》卷前《图经·城池图》,《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47页;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松江》,第5-7页。

③ 嘉庆《松江府志》卷75《名迹志·寺观》引明沈恺《重修寺记略》,《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2册,第712页。

④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祥异》,第3b、5b页。

⑤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纪风俗》,第3b页;卷3《纪土木》,第11b页。

⑥ 乾隆《娄县志》卷2《建置志·城池》引陈子龙《西郭闭门台记》,《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5册,第31页。

⑦ 崇祯《松江府志》卷3《衢巷》,第68页。

⑧ 崇祯《松江府志》卷19《城池》,第496页。

⑨ 绍熙《云间志》卷中《祠庙》,《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28页;正德《松江府志》卷15《坛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812页。

⑩ 绍熙《云间志》卷中《寺观》,《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23-28页;正德《松江府志》卷18《寺观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6册,第55-101页。

⑪ 乾隆《娄县志》卷2《建置·仓廩》,《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5册,第34-36页。

⑫ 绍熙《云间志》卷上《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3页。

尚在其西。《云间志》又载,宋代酒务在县西五百九十步,市舶务在县西六百步,大体皆在后世西门内;税务则在县西七百步,当在长寿桥与平政桥之间,与安济院距离不远;另有东税务在县东八百步,应在后世东门外。^①此外,清代西门外有天后宫,其建置由来不详,但“旧传庙基即朱谔故第”,^②朱系宋人,则宋代这一区域已有官绅宅第。这些材料强烈暗示,最晚到南宋,后世西门外已形成商业街及居住区,东门外当也已有市廛居舍。当然,也应看到,后世长寿桥以西的一系列桥梁,如泽润桥、望恩桥、庆云桥乃至秀野桥,《云间志》中尚不见记载,^③说明其时长街向西延伸的范围有限。但无论如何,早在元末筑城之前,松江的线型城区格局当已形成,且其范围已经越出后来城墙圈围的区域。

就城市功能区而言,作为明清时代的府城,城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衙署。重要的如松江府衙,旧为华亭县衙,略近城内中央部位,南临郡治大街及秀州塘,经爱民桥过塘面对一条南北向的直街为府南大街;^④华亭县衙在府治西,同样南临郡治大街及秀州塘,经望云桥过塘为南北向的右文街;^⑤娄县县衙在府治北偏东,南临邱家湾,顺治十三年分县时“初寓治于水次仓(即西仓)公廨”,顺治十五年“以官钱易明司业朱大韶故第为县署”;府学及文庙位于府南大街以南,集仙门西北,东临南禅寺,为宋代所建华亭县学旧址;华亭娄县县学及文庙位于崇文里以西,普照寺弄以东,宋代为徐进义塾,元初置松江府,明初改建华亭县学于此;明东察院在府衙以东,南临大街及秀州塘,西为察院巷,过秀州塘西南为南门大街,入清后改为试院;明南察院在华亭县学以北,入清后废;提督署在仙鹤观西,明代为济农仓址,后改为徐阶元辅第,入清被占为提督府,前有演武场;^⑥清代中、前、后、左、城守诸营官署,分散在城中各隅。^⑦总的来说,这些衙署在城中的分布予人零乱的印象,由于城墙本身并不规则方正,其方位很少体现出所谓“礼制”的色彩,就整个城市建成区来观察,更是如此。

工商业大体以东、西门外大街最为繁盛,这从前引陈子龙的描写,及范濂关于晚明鞋袜制造业分布状况的描述中可见端倪。据近代资料,松江商会位于东岳庙后,^⑧西门外大街以北还有一些商人会馆,著者如宁绍会馆、徽州会馆(见图1)。清代兴起的民间善堂也大多数集中在西门以外,如嘉庆年间已建者:普济堂在城外白龙潭侧,育婴堂在谷阳门外超果寺西北隅,华娄同善堂在谷阳门外,兴善堂在府治西门外。^⑨此后依次兴建者:牛痘局在谷阳门外井堂街内,助葬局在白龙潭东,莲花庵恤嫠局即惜字局在白龙潭北里许,崇善堂在谷阳门外坊一图谷水道院东偏,协善局在谷阳门外六十图月字圩。^⑩只有全节堂在普照寺西旧太平书院址,辅德堂在广明桥巷文昌宫内,位于城墙以内。^⑪

士绅居第,据晚明时的记载,旧“多有居城外者”,后期则“缙绅必城居”。^⑫晚明至清初两部记

① 绍熙《云间志》卷上《场务》,《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1页。

② 嘉庆《松江府志》卷17《建置志·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361页。

③ 正德《松江府志》卷10《桥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496页;绍熙《云间志》卷上《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3页。

④ 嘉庆《松江府志》卷3《疆域志·衢巷》在“集仙街”下记有“东通府南大街”数语,《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114页。该街在民国时期改称“县前直街”,见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松江》,第5-6页。

⑤ 乾隆《华亭县志》卷1《疆域志·街巷》称“望云桥南一街过钱家桥为右文街”,其南段则为崇文里,《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影印本,华中地方第462号,第106页;该街入民国后改称法院街,见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松江》,第5-6页。

⑥ 关于徐阶第的变迁史,见范濂《云间据目抄》卷5《纪土木》,第3a-3b页,叶梦珠《阅世编》卷10《居第一》,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第235-236页。

⑦ 以上诸衙署,详参嘉庆《松江府志》卷14《建置志·官署》,《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309-314页;卷15《建置志·古署》,《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320、326页;卷16《建置志·公建》,《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335页;卷30《学校志·松江府儒学》,《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644页;卷31《学校志·华亭娄县儒学》,《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661、670页。

⑧ 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松江》,第5、7页。

⑨ 嘉庆《松江府志》卷16《建置志·公建》,《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337、340-341页。

⑩ 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志·仓庾附公所义局》,《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5册,第84-90页。

⑪ 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2《建置·善堂》,第236-237页。

⑫ 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第186页。

载松江士绅宅第的笔记,所涉及的居第大多数确实在城内,^①松江城作为衙署、兵营和士绅居第的集中地,殆无疑义。但另一方面,士绅居第并不限于城内。嘉庆《松江府志》记载了华亭县境内的明代士绅居第 77 处,其中在“城东”或“东门外”者仅有 3 处,清代士绅居第 8 处,其一在东门外;此外娄县境内的明代士绅居第 72 处,在城外者却超过 30 处,清代士绅居第 21 处,在城外者至少亦超过一半(均未计在乡村及市镇者)。^② 由于清代分县之后,西门外的广大城区均划归娄县,以上简略的统计,实际上反映出西门外同样是重要的士绅居住区。

在明清两代,除了嘉靖倭乱外,松江还会两次遭受战祸破坏。顺治二年(1645,南明弘光元年)清兵南下,于八月克陷松江,大加屠掠。据时人记载,“清兵自秀野桥起火,直烧至东门外。南门起火,直烧至府前谯楼。俱为灰烬。北门四周俱烧尽,存者只有十分之一二”。^③ 咸丰十年,太平军两陷松江城,均旋被清军收复,此后双方在松江、青浦一带相持两年,松江西门外再度遭受严重破坏。咸丰十年太平军第一次陷城期间,乡民“与贼彼此焚屋相拒,塔桥以西,跨塘桥以东尽成瓦砾”,同治元年为防御太平军再度攻城,又由华尔建议,“尽毁西门外民房,塔桥东水关西,向之仅存者今又尽焚矣”。直至光绪初年,西门外大街秀野桥以东仍是“民屋起造,十不得一”,以西至包家桥“间有未经起复者”,其余附郭街巷也多未复旧。^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300 余年间遭受了三次大规模的破坏,松江城区的整体格局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城市的重建看来受制于固有的河流、街道及桥梁体系。利用重建的机会进行重新“规划”的想法,除了前述在西郊筑城的提议以外,在地方文献中不见记载,城市重建的实践也未在这方面受到影响。

三 明清以来松江的工商业及其区域地位

明清时代的松江府,为全国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号称“衣被天下”,那么,作为行政中心城市的松江府城,在该项手工业生产及商品贸易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呢?

传统上,明清时代的棉纺织业被视为“基本上是农民家庭手工业”,而且,由于生产的机会成本极低,这种家庭生产基本上排挤了城市手工工场的出现,这与同时代的丝织业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只有棉布的加工环节,如染、踹等业,才较多地集中到城市中。^⑤ 明代江南的棉布加工业,著于文献者有松江府枫泾、朱泾等市镇,及邻近江南的芜湖等地,清代则绝对以苏州为中心,松江府城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染、踹等业的存在,但资料相当稀少。^⑥ 然而,松江府城居民确实从事棉业生产,如明代方志的著名记载:“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绵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⑦ 这一记述还反映出,府城的棉业生产可能以纺纱为主,清初碑刻亦称:“村野当农隙之候,妇女弄梭,主伯亚旅,更相效勤以佐之。若城市红女,悉力纺纱,售之乡民。”^⑧ 吴承明等认为,类似的现象是“由于(生产者)贫穷无本,或寡妇、里媪没有家庭劳动力,就只能纺纱”,清代的棉纺织业中,纺、织两道工序“基本上没有分离”。^⑨ 但上引后一条史料明白认为城、乡棉纺织业存在着分

①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 5《纪土木》,第 3a-11b 页;叶梦珠《阅世编》卷 10《居第一》,第 235-241 页。

② 嘉庆《松江府志》卷 77《名迹志·居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 2 册,第 763-769、777-785 页。

③ 姚廷遴《历年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62 年,第 23-24 页。

④ 光绪《娄县续志》卷 13《兵事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 5 册,第 462-478 页;卷 3《疆域志·街巷》《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 5 册,第 99-100 页。

⑤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2 页。赵冈:《评黄宗智过密型增长的理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⑥ 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 412-419 页。

⑦ 正德《松江府志》卷 4《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 5 册,第 214 页。

⑧ 《官用布匹委官办解禁扰布行告示碑》(康熙十一年),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9 页。

⑨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 405 页。

工,因此相关结论或应留有余地。^①

另一方面,即便府城“红女”以纺纱为主,也不能否定城中织户的存在。西嶋定生较早地指出,松江的“织布经营,从布局上分为农村和城市二种形态。其中,前者为农户的副业生产,后者为机户所从事的专业性生产”。二者“好像在制品上也有某种程度的差别,虽然这种差别并不严密。即后者(当为前者——笔者注)主要是织造粗布系统的棉布。……城市织布业的特征是织造高级棉布”。^②进而言之,城市机户可能以织造“上纳棉布”为主。西嶋的依据主要是崇祯《松江府志》所载郑友玄《布解议》所述:

旧例解户四名,领解梭布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匹。棉布四万八千九百三十五匹。……今在城机户,惯织官布者,原自有人。查布分别二线、三线,有每匹定价三钱八分或四钱者。各增二分,则机户不谓厉己也,而任之矣。机户既定,则分派里排,令各买二、三十匹上纳,即算除白银比簿之额。且一、二月之前,以银交机户,报数在官,已免里排比责。一、二月之后,仍严限机户交布。其不如式者,止责之机户,则里排无受勒交赔之累,亦不谓厉己也,而任之矣。^③

据此则松江府城确有“在城机户”,而且产品相对较高端,因此得以专任“上纳棉布”的生产。西嶋定生并引《阅世编》所述“棉花布,吾邑(指上海)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从而认为飞花、尤墩、眉织三种布匹为松江府城所产的“高级棉布”。^④明代文献的记载中,有谓“布缕之变,志称三梭布,后用云布,今有七寸、九寸为标布官布,又有飞花布、丁娘子布、织花绒布为眉织,今京标染青皆新改放长,名色旧贵尤墩布,以其厚且重,不便穿制,织者亦稀”,^⑤可与其论点相互印证。

西嶋定生复强调府城“机户的……性质,本质上是以政府的收买为前提而进行生产的定货生产者,是存在于以一般市场贩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形态之外的。而且,重要的是,政府收买机户生产产品的财源是从农村征收的派征棉花(当为布——笔者注)的折征款”。^⑥认为府城机户只从事上纳棉布的生产,其产品不进入市场,对此应稍作分析。前引《布解议》中,所谓“在城机户,惯织官布者”,是“惯织官布者”仅为“在城机户”的一部分,其意甚明。就其所载华亭县每年上纳棉布六万五千余匹的解额,按每机户每两天成布一匹计算,不过是360户一年的产量。前引明代文献关于“松城”出产各种优质棉布的记载,显然也更多地视之为商品,而非“贡品”。这都显示,西嶋的结论恐怕太简单,他立论的要旨在于否定松江府及上海、青浦等地城市棉织业商品生产性质的“真实性”,难免有“结论先行”之嫌。^⑦

① 李伯重对这一问题已重做剖析,认为明清江南“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在一个小社区(如一个村子乃至一个市镇)的范围内,这种分离和专业化较早就达到了相当普遍的程度,而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也逐渐增加”。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② 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615页。

③ 崇祯《松江府志》卷11《役法一》引“崇祯己巳华亭郑公友玄布解议”,第289—290页,西嶋引文与此略有出入。

④ 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15页,中译本误尤墩为龙墩。所引见叶梦珠《阅世编》,第175页。

⑤ 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第185—186页。

⑥ 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21—622页。

⑦ 稍晚于西嶋定生,中国学者在有关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也注意到这条史料。杜黎据此论证“在城”专业织户的存在,徐新吾则反对这一观点。他们关于《布解议》的释读都存在问题,因此结论各走极端,此不赘。见杜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纺织业生产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61页。在稍晚出版的另一著作中,徐新吾就此问题结论称“松江城中居民亦有纺纱织布者,但数量甚少”,但并未提供依据,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另按,一般认为,明清江南织成一匹布所需时间,在一个劳动力的前提下约为六到七天,在农户全家协作的条件下则大约二至三天可成一匹,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51、201—202页。明清文献中,关于机户日成布一匹的记载比比皆是。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398—399页;李伯重《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45—376页。徐新吾认为,“官布的规格要求比一般品种高得多,匹长与匹重都要加倍,日不能成一匹”,见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61页。但城市机户既属专业性质,生产效率也当比一般农户高,两天成布一匹的估计是比较保守的,徐氏本人大致也以两三天成布一匹为“在城机户”的生产效率标准。

当然,除了产品可能较为高端之外,松江府城的棉纺织业看来只是区域产业连续分布的一个局部,并不具有突出的“中心性”或“城市性”。而且事实上,所谓“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揆诸明清江南其他棉纺织区的情形,更有可能是以府城为集散中心,分散在城乡生产的几种棉布产品,并非仅在城内生产。就府城在棉布贸易中所居的地位而言,情形也类似。号称“衣被天下”的“松江布”,实际出产于整个府境范围内,既非松江一城,也不以松江府城周边为中心。明清至于近代,描述松江布业的史料可谓众多,然而能在空间上将贸易集散中心落实到松江府城的记载,却相当少见。^①据明代商书关于江南商路的记载,“苏、松二府至各处水路”,“路须多迂,布商不可少也”,仅苏州与松江二城之间的水路,就有苏州府由嘉兴、松江至上海,松江府由官塘至苏州府,松江府由太仓至苏州府,松江府搭双塔船至苏州府,苏州府由周庄至松江府,松江府由嘉善县三白荡至苏州府,苏州由陶桥至松江府等数条路线,此外复有松江经南翔至上海,由烧香山至白鹤江,至金山卫、吴淞所、乌泥泾等各个方向,记载的详细程度堪称各地商路之最。^②这一方面反映出,对于前往松江收购棉布的明代客商来说,苏州、松江二城在交通上居于枢纽地位;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对于这些商人来说,收购棉布必须深入各地市镇乡村,不能仅依赖一两个中心集散地及一两条商路干线。也就是说,至少就明代而言,江南棉布的贸易集散地应是相当分散的。

无论如何,松江府城在这些分散的棉布集散地中仍据有一席之地。除了《阅世编》所谓“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之外,较早的史料已有“细布出东门,盖车墩去东门不远”^③的记载,当指产于车墩的细布由府城东门的布商收购。清康熙十一年(1672)的一通碑刻中,列举了“华亭县布牙”25家,“华亭县布□”(该字漫漶,推测或即“铺”字)57家之后,复列举“在城布铺”8家,染坊6家,^④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府城布业在华亭县所占的比重。此外,乾隆元年(1736)另一碑刻中,特别提到徽商吴與璠,“投治西外开张富有字号,在郡门市居多”,^⑤说明府城确有较大的布商字号。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碑刻也反映出,清初以来松江布业开始依附于苏州,后者逐步建立起地区棉布集散中心的地位,棉布加工业也随之勃兴。^⑥

以上分析显示,明清时期松江地区发达的棉布生产和贸易,其地域分布较为分散,松江府城在其间并不具有突出的中心地位。但无论如何,棉布的生产和贸易确实是府城重要的经济活动,府城居民绝非仅知“消费”、不事生业的食利者,府城经济也非仅服务于“贵族官僚”。这些特点还从明清以来松江城市经济的其他方面呈现出来,在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中,松江城市手工业最著名者并不是棉业,而是具有突出的专业化、市场化生产特征的鞋、袜等小件衣物制造业。早在正德年间,松江府城已盛产漆纱巾和蒲鞋,前者“吴下皆有,出府城者最佳,贩鬻邻郡,号松江方巾”,看来已经粗具专业化商品生产的特点,后者“出东门三里汀者佳,有极细巧者”,似尚无贩鬻远方的情况。^⑦至

① 《江南土布史》辑录的史料可谓丰富,编者并概括“清代松江成为土布贸易中心”,然而这些史料实际上没有一条能够指实松江府城为棉布贸易的中心。相反,如学界所熟知的清人顾公燮的记载“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似反能证明这两个市镇才是“松江布”的收购贸易中心(《江南土布史》引用这段史料在“松江”之后点断,即以松江与二镇同为布业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话,揆诸常例,这里的记载当作“府城枫泾洙泾”)。参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56-65、71-79页。

②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7《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268页。除了杨书之外,对这些商路的详细考证,参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2页。

③ 正德《松江府志》卷5《土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252页。

④ 《官用办解禁扰布行告示碑》(康熙十一年),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94-96页。

⑤ 《松江府为禁苏郡布商冒立字号招牌告示碑》(乾隆元年),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7页。

⑥ 顺治十六年(1659)碑刻称,金三阳等“布店在松,发卖在苏,且牙行亦多居松”,乾隆元年(1736)碑刻则称“松郡各邑产布,甲于他府。昔年开张青蓝布号者数十家,通商裕课。后有迁移他郡地方,今仅止数号”。而立碑申禁的原因,都是因苏州布商假冒松江字号。从这些描述中看,清代松江本地布业确实在逐步衰减,仅有代苏州布商收货的牙行仍然兴盛,但松江布及布商“老字号”却始终保有较高的声誉,这些布商中的相当数量可能已迁移到了苏州,至少其营业的重心已转移到苏州。

⑦ 正德《松江府志》卷5《物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254-255页。

万历年间,范濂有关松江瓦楞帽、宕口蒲鞋、尤墩暑袜的生产和贸易的详细记载,已为学者熟知。^①从中可知,当时松江制帽、制鞋业的行业规模很大,特别是蒲鞋店和暑袜店各有百家以上,其生产已称得上高度集中,专业化的程度也已相当高。就市场范围而论,暑袜有“远方争来购之”的明确记载,蒲鞋、髻帽及鞋店的产品也不可能只供应本地的消费。制髻帽和制蒲鞋的工匠分别来自安庆和宜兴这一点,更说明松江这些行业的发展,是利用当地在市场和贸易方面的区位优势,吸纳外地的劳动力、技术,可能也包括资本,而逐步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

应该指出的是,有关松江府城各项生业和出产的记载盛于明代,晚明崇祯时期的方志中,尚叙述当地各种鞋履的形制,复称“市中造袜,客为收买,曰尤墩布袜”,并沿袭前志关于蒲鞋、漆纱巾的记载。^②仍可印证范濂稍早的叙述。然而,清代之后,松江的鞋、袜、帽业变迁的轨迹不明,最后更消失在地方文献中。^③在清初,这还可能是记载漏略的缘故,但在晚清以后,松江府城的这些制造业看来是完全消失了,民国初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当地观察的情况,是当地“可以被视为工业的很少”,只有“附近的民家从事向上海输出的刺绣,此外近郊土布的织造稍为繁盛”而已。^④由于文献缺乏,我们无法追溯,在范濂的时代兴旺于松江东西门外、产业规模或达数百家的鞋袜制造业,究竟在什么时代衰落而星散。^⑤

无独有偶,在明代地方志中,松江府城还是丝织品的出产地。特别是“线绫”,“自唐有之”,明代中叶“多出府城,东门尤盛。制作之精,为天下第一,虽吴门不及也”。^⑥至明末,线绫的织造“郡中尤盛,每织一赚,必选上等明亮蚕丝,视他郡用丝倍之,工力亦倍之”。此外还有“上供者,幅广而长,曰官绫;用黑绒抹作龙蟒者,曰蟒绫;又有缜密而轻如縠者曰纱绫,皆织染局造”。当地织工还利用棉织业发达的条件,利用织布机创造出“布机绸”。织造的原料,则全赖“贸丝他郡”。^⑦这些丝织品的生产,与明代设在松江的官营织染局有密切的关系,从其原料的来源来看,当地实无从事丝织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因此,进入清代,随着织染局的裁撤,松江的丝织业生产迅速消失。^⑧

在贸易经济方面,近代以来棉布贸易衰落,松江府城作为区域性粮食集散中心的地位却凸显出来。据1930年代的调查,松江及周边青浦、金山等县均为产米区,而数县粮食均以松江城为“输出之集中地”,主要输出方向是上海。各乡镇如泗泾、叶榭、枫泾、朱家角及青浦县城虽亦有米市,但多系“收集乡货”后,“转向松江输出”。虽然随着上海的日益发达,各乡镇也逐渐直接与上海米市发生联系,不再通过松江转运,但松江城区仍为当地最大的米市,有米行一百余家,年输出量略少于80

①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2《纪风俗》,第1b、3a-3b页。

② 崇祯《松江府志》卷6《物产》,卷7《风俗》,第171、185页。

③ 康熙《松江府志》大体照抄崇祯府志的记载,乾隆时期的两部县志中,有关“物产”的记录都非常简略,其中均无关于蒲鞋及其他鞋类、暑袜、髻帽及漆纱巾的记载,见乾隆《华亭县志》卷1《疆域·物产》,第122-123页;乾隆《娄县志》卷11《食货志》,第126页。嘉庆《松江府志》卷6《疆域志·物产》对各类器用物产掇拾甚详,但多系抄录旧志,且亦仅记有蒲鞋一项《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171-172页。至晚清时代,“物产”门中所载“服用之属”仅寥寥数种,全不见鞋、袜、帽等产品的踪迹。光绪《松江府续志》卷5《疆域志·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3册,第125-126页;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23《杂志·物产》,第1747-1748页。

④ 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15卷《江苏省》,台北南天书局1988年影印1919年东京版,第160页。按所谓“向上海输出的刺绣”,当即“顾绣”,原产于上海,乾隆年间《娄县志》首载顾绣“今郡城内外人多习之”,看来是清代始传播到松江并在当地发展起来的手工业。

⑤ 据地方文献的记载,民国时期松江县城“鞋帽业较为兴盛”,“全县从事鞋帽皮革生产的有44家,其中布鞋5家,皮鞋9家,皮鞋钉1家,上鞋修鞋20家”,县城至少有皮鞋店4家。这些鞋帽店看来都属于本地日常商业或服务性的性质,数量既远不能与晚明时期相比,其历史延续关系也不清楚。参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松江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

⑥ 正德《松江府志》卷5《物产》,《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丛刊续编》,第5册,第253-254页。

⑦ 崇祯《松江府志》卷6《物产》,第149页。

⑧ 嘉庆《松江府志》卷6《疆域志·物产》虽仍列举绫、布机绸、锦、只孙、纱、画绢、乌丝绢等丝织品的名目,但看来只是抄录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1册,第172页。乾隆年间的两部县志中,《娄县志》完全未记录丝织品的出产,《华亭县志》卷1《疆域志·物产》则明记锦、绫、纱、乌丝绢、只孙等丝织品为“昔有而今无者”,《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62号,第1747页。实际上,锦、只孙这两种产品在正德府志的记载中已称“今亦未见”。

万市石,主要的交易场散布于东、西门外。^①米市的繁荣在近代以前不见于记载,樊树志因此认为,松江米市在近代的兴起反映了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变化,即由于“盛极一时的棉布市场”不复存在,农业生产中粮食的比重增加,催生了兴盛的米市,类似的现象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地区都曾出现。^②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的松江府城至少一度曾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不仅出产棉布,而且是丝织品、尤其是鞋袜等小件衣物的产业集聚区。清代以后,该城的手工业经济似乎陷入衰败,到晚清民国时期已经没有多少生产性的“工业”可言。但是该城在区域市场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中心节点的角色,不论是布市还是米市,都涉及当地农村产品的集散和交易,松江的城市经济因此始终与周边乡村及远方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作为行政中心的松江城,与明清以来以“专业市镇”著称于学界的江南各大市镇,在经济职能和性质上并无二致。近代松江在区域粮食市场上所具有的地位,更显示了相对较高的市场层级。民国时期的资料显示,“松江镇是全县的商业中心,纯商业网点集中在松江西门外至马路桥一段,秀野桥以西的秀塘滩是水产、瓜果、蔬菜的集散地”,1943年,“全县共有商、贩4184户,其中松江城区1260户,泗泾镇243户,新桥镇105户,天马山镇264户,小昆山镇86户,华阳桥镇115户,车墩镇15户,五厍镇87户,甬钩湾镇41户,李塔汇镇47户,叶榭镇140户,张泽镇115户”。^③也充分印证了松江城在当地商业体系中具有的优势地位。

小 结

对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普遍忽视中低级治所城市的原因,前人已做过一些分析,如称“苏州、杭州、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有特色,资料更加丰富,研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与中心城市相比,次中心城市也许不那么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研究起来既缺乏资料,需要从头做起,也可能缺乏研究价值,花了功夫也不一定有什么成果或者成果有限”。^④除了“资料局限”的客观事实之外,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相关研究冷热度背后的理论预设:苏州等“中心城市”是“特殊”、“有代表性”、“有特色”的,因此具有研究价值;相反,这些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治所城市,大概就只是“普通”的、“无代表性”和“无特色”的,因此而“缺乏研究价值”了。

然而,如果对于大多数治所城市并没有做过细致的分析,那么凭什么来判定哪些城市是“特殊”“有代表性”的,而其余城市则是“普通”“无代表性”的呢?正是在这一点上,类似的观点只能被视为预设结论,正是这种预设结论使我们不加分析地否定了多数治所城市的“研究价值”。具体而言,在城市历史地理、城市形态史的研究中,或多或少但普遍存在的一种信念,是中国古代城市在空间形态上受到国家权力和礼制观念的强烈影响,因此具有突出的规划性和礼制象征色彩。这种观念主要是从几座著名都城得出,却被学者们推广为“中国古代城市”的普遍特征,似乎对几座都城做过论证之后,其余中低级治所城市的特点即可不证自明。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潜藏的预设结论则具有“特殊”与“普通”之对立的特点。简而言之,获得学者们高度关注的苏杭宁沪等大城市以及江南市镇,其城市职能被认为是特殊的:它们都是工商业集聚、经济职能超过政治职能的“新型”城市,是变革的中心。相反,传统的“普通”城市,只是一个个处于政府严密控制之下的单一“行政中心”,其工商业不发达,经济职能不重要,与“苏杭型城市”及“新兴工商业市镇”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关注变化的历史研究来说,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通过对明清时期松江府城的个案探讨,本文试图对这些支撑过去城市史研究的(下转第67页)

① 羊冀成《松江米市调查》,转引自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413-414页。

②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412-413页。

③ 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松江县志》,第481页。松江镇即松江城区,所谓“纯商业”,指服务业、饮食业以外的商业店铺。

④ 叶舟《清代常州城市与文化:江南地方文献的发掘及其再阐释》,第10页。

时期。

根据以上史料显示,明洪武时期,闽东业已形成东面为福宁州烽燧,南面和西面为屯田军,险要地段设巡检,核心地带为县治所在地,在各个点之间通过铺递加强联络的军控网络。闽东为福建最早克复的地方,曾为明克复全国的大后方,按常理,应最为安全,且经过洪武三十年的发展,政治更趋稳定。但永乐初年却大力强化军控,最终形成极为严密的军控网络。为什么永乐帝要不惜代价、耗费如此巨大的军力在闽东布置严密网络?莫非永乐帝已察觉出建文帝出亡宁德的蛛丝马迹?显然,这也反面间接证实了建文帝出亡宁德的事实。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的物证和事证,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初步结论:

第一,云锦袈裟物证与历史文献记录相符,且与上金贝古墓隐含的信息相呼应,支提云锦之主人 与上金贝古墓墓主应为同一个人,且具备“九五之尊”与僧人双重身份,而明初具备“九五之尊” 与僧人双重身份者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和靖难之役中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明太祖帝陵在南京,正史中斑斑可考,唯独此主人正史和地方志书无考。所以,支提云锦之主人 与上金贝古墓墓主最大可能只有建文帝朱允炆。

第二,建文帝近臣郑洽更名郑岐或郑三合潜伏于上金贝山脚的宁德郑岐村,并且其墓葬位于宁德市蕉城区金涵乡濂坑村后壑坑,背靠上金贝古墓,与上金贝古墓在同一中轴线上,采同一坐向;郑岐村村落面向上金贝,背对大海的奇特布局,与“枕山、环水、面屏”的基本风水格局相左。但这符合浙江浦江郑义门忠孝家风,这无疑进一步佐证建文终亡宁德。而从浦江郑义门和宁德郑岐村现存族谱查考比对可知,郑岐即郑洽的更名,且两地郑氏家风相近,这更有力地佐证了建文帝出亡宁德说。

第三,明初钦差郑和与周觉成奉旨到宁德之事在正史和地方志中被隐去,以及永乐间《宁德县志》中连续三位宁德知县材料被删除,而同期在福建其他地方志主政者的记录相对完整,此现象与地方撰史体例不合。这绝非偶然疏漏,显然与永乐帝登基后发动的销毁建文时期有关建文档案、篡改历史记载的“清洗记忆”运动有关。永乐皇帝不惜代价、耗费巨大军力在闽东布置严密的军事控制网络,则可能与 他已察觉建文帝出亡宁德,故而在宁德采取军事严控措施。这些事实虽不能成为建文帝出亡宁德的直接证据,但亦从反面印证了建文帝出亡宁德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建文帝出亡宁德不但可能,而且是事实。

(责任编辑:归 愚)

(上接第 11 页) 预设结论展开反思。研究的初步结论显示,明清松江府城在城市形态上具有突出的有机生长特征,很难从中找到“规划”和“礼制色彩”的影子;作为一座“行政城市”,松江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经济,尤其从明清至近代始终充当着区域贸易集散中心的角色。在这两个方面,作为治所城市的松江府城与所谓“新型”的、其地理与经济特征业经充分阐述的江南市镇之间,并不存在表象和性质上的差异。这一结论也揭示,只有对此前受到普遍忽视的中低级治所城市作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我们对于传统中国城市的认识才能够得到推进,而不是始终停留在未经实证研究检验的预设结论的层次上。

(责任编辑:杜 倩)

Abstract

Prosperous Prefecture: Urban Form and Economic Function of Songjiang City (松江城) since Ming Dynasty HUANG Jing-bin

Though inferior to the great cities such as Suzhou, Hangzhou and Nanjing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fluence, Songjiang city was typical in prefecture and county cities of Jiangnan. The build-up area of Songjiang city was typical “organic growth” form since Song Dynasty, with a linear long street which grew up along a river. There were flourishing handcraft industries in Songjiang city at least for once, and the city played as regional commercial central place throughou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Rights of Registration to the Enemy Subjects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LUO Zhen-yu, FU Liang

The Beijing Government chose to join the Entente Powers in 1917, trying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 and recover part of the lost sovereign. The Kiangsu Commissioner of Foreign Affairs carried out the registration and inspection to the enemy subjects liv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which clashed with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To avoid “losing the greater”, the Beijing Government could only conceded to the Council. The local diplomatic practice reflected the hardships Beijing Government suffered when recovering the lost sovereig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Conversion and Its Social Origins of Hangzhou Hotel Indust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N Ya-fang

Based on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origins on the change of Hangzhou Hotel Industry and deems that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capital investment is its solid found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market promoted by modern transportation is its important opportunity, new social fashion is its boost and the change of Hangzhou modern urban center is the objective reasons of the flourishing of hotel industry. It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otel industr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Discuss the Na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bout Scroll Fragment of the Zheng Xuan's Notes of the Analects (论语郑氏注) Which was Copied in the Tang Dynasty Again DING Hong-qi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fact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which include Jin Shi (进士) and Ming Jing (明经),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Zheng Xuan's notes of the Analects* wasn'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Jin Shi could be ruled out. Thus the rest possibility is the Mo Ce (墨策). This argument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Mo Ce deeply until it was not clear to the present. Moreover, it can help to have a more clear understanding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Ming Jing examination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